

移民人口对区域经济的影響

叶牧暘

摘要: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移民人口对国际以及区域间的经济、文化、政治发挥的影响力日渐扩大。文章在主流人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世界移民现状及特点的分析,结合以往国际、区际人口移民经验,探讨人口移民对区域间的经济影响。

关键词:移民人口;区域经济;影响

作者简介:叶牧暘,男,英国约克大学经济系。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2)05-0088-08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形成,世界人口流动频繁,世界性移民潮渐成常态。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人口移民的数量、频度愈发增加与加速。这种世界性移民潮的形成,无论对人口移出国还是人口移入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引起了相关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人口移民已成为复杂的国际化问题。本文基于此问题阈,着重探讨移民人口对国际相关区域经济的影响。

一、世界移民的现状与特点

狭义上讲,移民是指为了在其他国家定居而跨越国境流动的人群,包括暂时性居住在内。游客和短期商务考察者通常不计入移民之列。广义的移民也包含一个国家内部区际间的人口流动^[1]。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十年中,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期间,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移民状况也有了显著的改变。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的交流与互动不断增多,移民数量日渐庞大。据华侨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版》显示,截至2009年,中国移民海外总人数已超过450万,目前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已达4543万,绝对数量位居世界第一^[2]。而外籍来华常住人口达25.6万,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以上数据仅为登记在册人数,并未包含短期在华务工人员、未登记者以及非法移民,因此,实际人数将远远高出登记在册人数。以广州为例,每年在广州临时居住的外来人口约为50万,来自亚、美、欧、非等几大洲的国家和地区,其中以非洲裔族群增长最为迅速,截至2011年,在广州的非洲裔人口数量已超过20万。

欧盟一体化进程提升了欧盟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促进了欧盟内部的移民自由化,同时吸引了更多来自非欧盟国家与地区的移民。据欧盟委员会的官方数据显示,2009年,300万人移入欧盟成员国,这其中包含了160万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移民。在诸多移民接收国中,以英国(56.6万)、西班牙(49.9万)以及意大利(44.3万)为首,这三国接收移民总数占欧盟当年移民人口流入总数的一半。同时人口移出数量排前三位的国家为英国(36.8万)、西班牙(32.4万)、德国(28.7万)^[3]。总体来说,除了爱尔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欧盟成员国中相对不发达国家)以外,欧盟成员国经历了移民净流入的过程,即移民流入人数大于移民流出人数。

此外,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移民国家,由于移民高福利、低门槛,长期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大量移民的涌入,移民占人口比重越来越大。自20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共有3500万移民

移入美国，占美国人口比例的 4.7%。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更为明显，两国的移民人口比例分别为 18%（加拿大）和 23%（澳大利亚），远高于美国^[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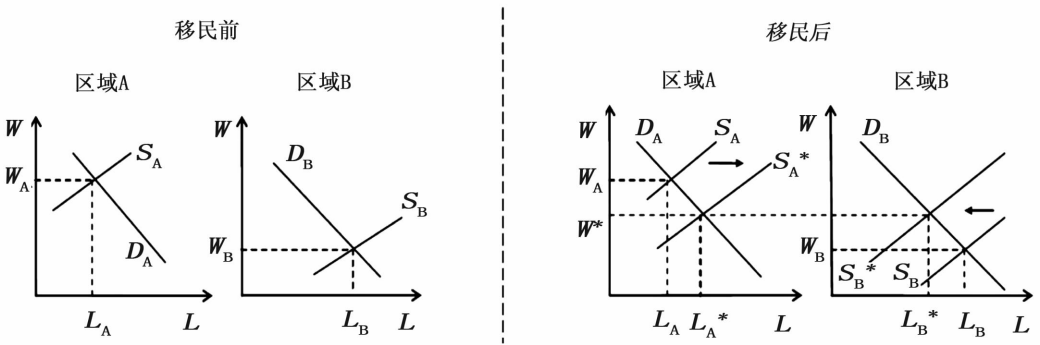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可以将世界移民呈现的趋势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1）数量上的持续显著增长。据国际移民组织（IOM）的数据显示，国际移民数量由 1960 年的 7600 万增加到 2000 年的 1.75 亿；截止至 2010 年底，国际移民人口已达 2.14 亿（约占世界人口的 3.3%）；此数字仍在不断增长，预计到 2050 年国际移民数量将达 4.05 亿人^[5]。（2）移民利驱化。大多数移民者通常由经济利益驱使，即从低收入国家/地区迁移至高收入国家/地区。据 2010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数据显示，全球 72% 的国际移民居住在发达国家^[6]。（3）移民人口种类多样化，且朝着精英化趋势发展。目前移民种类主要分四大种：亲属类移民、职业类移民、难民类移民以及非法移民。而职业类移民由 19 世纪初以来的低端劳务输出向高端技术人才移民转变，如二战后，有 50 多万的高级技术人才移民美国，其中有 43 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7]。

二、主流经济学派对移民问题的观点

移民现象虽自古有之，然而随着人类走入现代文明以及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移民问题受到各大经济学派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相继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的论述。到 20 世纪，主流经济学派对移民问题的观点分化为两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即“新古典主义学派”和“凯恩斯主义”。

（一）新古典主义学派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兴起于 20 世纪初的经济主义思潮。它源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与奥地利经济学派，后期代表人物还包括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新古典主义学派秉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立场，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对于移民现象，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模型将它阐述为：资本与劳动力流动是对生产要素价格区域间差异的反应，资本是假定流向收益最高的地区，而劳动力则流向同等情况下提供最高实际工资的区域，两者的流动皆是追求利益回报最大化的一个过程^[8]。



(1) 市场劳动力供需以及薪水的初始状态 (2) 区域间移民，缩小了两地薪水差异，最终达到了新的平衡点
纵坐标 W 代表薪水（Wage），横坐标 L 代表劳动力（Labour），D 代表需求（Demand），S 代表供应（Supp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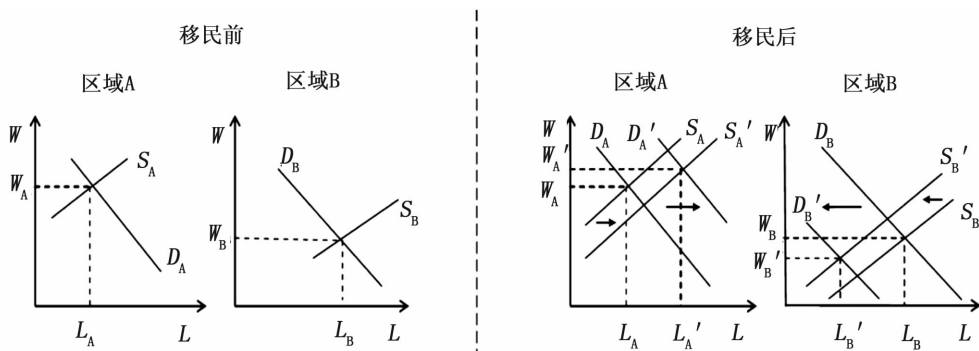
图 1

如图 1 所示，在移民发生前，区域 A 的薪水高于区域 B（ $W_A > W_B$ ），由于要素价格区域差异驱使，劳动力由区域 B 向区域 A 迁移。这造成区域 A 的劳动力增加以及区域 B 的劳动力减少；因此区域 A 的供应线向右平移（由 S_A 平移至 S_A^* ），区域 B 的供应线向左平移（由 S_B 平移至 S_B^* ）。理论上讲，只有当帕累托平衡（Pareto Equilibrium）重新达到时移民才会停止，即两区域间收入完全相等（ $W_A = W_B = W^*$ ）。

由此可见,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观点认为人口移民在区域经济中所产生的是一种平衡效应 (*Equilibrating Effect*)。其目的是为了减少移民输出与接收地区间的发展不均衡。因此,他们主张各国政府应当减少移民限制,放低移民门槛,从而使劳动力能根据地区薪水差异做出自动反应与调整。

(二) 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是当时“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直接产物。与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自由经济理论不同的是,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应当干预经济发展,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调节总需求从而减少失业、消除危机。而对于移民对区域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凯恩斯认为,不应单纯地从供应方面的因素考虑。如果在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基础上,加入需求方因素的变化,区域经济将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1) 市场劳动力供需以及薪水的初始状态

(2) 区域间移民,使两地间薪水差异进一步扩大

纵坐标 W 代表薪水 (Wage), 横坐标 L 代表劳动力 (Labor), D 代表需求 (Demand), S 代表供应 (Supply)

图 2

与图1中的案例相同,最初,由于要素价格区域差异驱使,区域B的人口向区域A迁移。在考虑劳动力供应变化的基础上加入市场需求的变化。移民的涌入(从区域B到区域A),将刺激区域A的内需市场(D_A 向右平移至 D_A');比如,新移民将增加当地的房产、医疗、教育、交通运输以及本地商品制造与服务行业的需求,从而使区域A的薪水进一步上调(由 W_A 移至 W_A' , $W_A' > W_A$)。与之相反的区域B,劳动力的减少将缩小该区域的内需市场(D_B 向右平移至 D_B'),同时使区域B的薪水进一步降低($W_B' < W_B$)。在这个比较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移民后,区域间薪水差异($W_A' - W_B'$)要大于移民前的差异($W_A - W_B$)。与此同时,资本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率也会随着人口的流动,从萧条地区转入繁荣地区,从而进一步扩大区域间差异。

因此,凯恩斯学派的观点认为,加入需求变量后,移民对两地间经济实际将产生不平衡效应(*disequilibrating phenomenon*),也就是进一步加剧区域经济两极化的发展^[9]。同时,凯恩斯主张,政府(尤其是移民输出国政府)应该对移民加以法律限制以及有效管理。

(三) 两种不同学派的相同与差异

新古典主义学派与凯恩斯理论同时解释了人口移民和资金流动的动力。然而,新古典主义学派理论在预测移民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方面过于理想化,仍然存在许多局限性。它单纯强调人口移民对区域间劳动力供应所造成的影响而忽略了与此同时市场需求所做出的相应变动。其理论构想建立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要素流动无成本且不存在其他移民障碍,要素价格具有完全的弹性等等一系列严格假设之上。同时,该理论默认移民将不会对区域间市场需求造成影响。然而,这种情况只存在于移民人口数量非常小的国家(特例,如朝鲜)。而在当今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以

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例如，英国牛津大学 2007 年对伦敦国际留学生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 2005 - 2006 年间，仅英国伦敦地区的国际留学生为英国贡献了 15 亿英镑的消费^[10]。而且这一估测仍被认为过于保守，因为它排除了当中的加速效应（catalytic effect），例如奢侈品、汽车、娱乐等消费以及它们所带动的相关的服务行业并未包含其中。移民人口实际所带来的对移民接收地区的经济包括消费刺激效应要远远高出预估水平。因此，移民对内需市场所带来的变化不应被忽视。相比之下，凯恩斯的观点更加切合当前国际形势与经济现状。凯恩斯理论在供应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需求变量。他强调移民输出（接收）地区的内需市场可能随着移民人口的迁出（迁入）而缩小（扩大），导致实际薪水的进一步下降（上涨）。从过去几十年的趋势看来，凯恩斯理论更准确地反映出移民对区域间经济所造成的差异，以及人口流失对移民输出地区经济产生的长期影响。

三、移民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利弊分析

由于移民问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移民人口对不同国家与地区间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也大为不同。因此，以下将把移民人口细分为国际移民（国际流动人口）与区际移民（一个国家之内的地区间流动人口）两大类分别展开讨论。

（一）国际移民

1. 移民人口对优化人口结构的积极因素

从传统人口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经济发展通常导致出生率与死亡率的降低。如图 3 所示，当前大多数人口接收国家（通常为发达国家）已达到“人口过渡”（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第四阶段，即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当中，部分国家/地区的出生率甚至低于死亡率，出现人口负增长的现象。长期而言，这将导致劳动力的减少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人口结构中的赡养比例进一步增加。对于现付现行（Pay as you go）的养老金体制将会是巨大的挑战。同时，劳动力的逐渐缺失会导致薪水周期性上调，从而使失业率进一步上升，造成长期经济疲软的恶性循环。反观移民输出国（通常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绝大多数仍处于“人口过渡”的第二与第三阶段。其特点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市场劳动力充足，部分地区甚至存在劳动力过剩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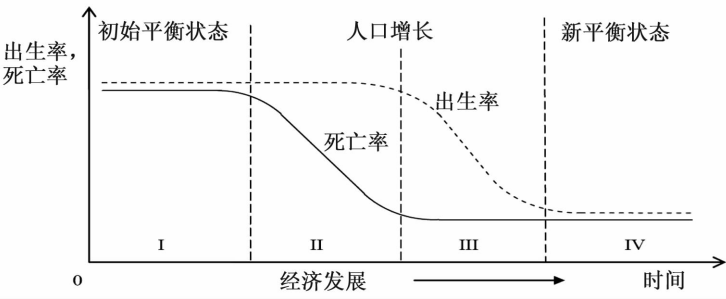


图 3

人口（劳动力）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之一，直接影响经济效益与活力。而移民则在优化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而且是积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移民输出地区）的过剩劳动力，通过人口移民的方式输入到发达国家原本不断萎缩的劳动力市场，促进了移民接收国家与地区的人口增长，缓解了当地人口老龄化状况，填充了部分就业岗位空缺，同时给了劳动力市场注入了新的能量，从而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生产效率，刺激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都从开放的移民政策中受益，以英国最为典型（如图 4 所示）。以 2002 年的英国人口为基数，若在无任何移民人口流入以及其他变动的情况下，自然人口曲线显示，从 20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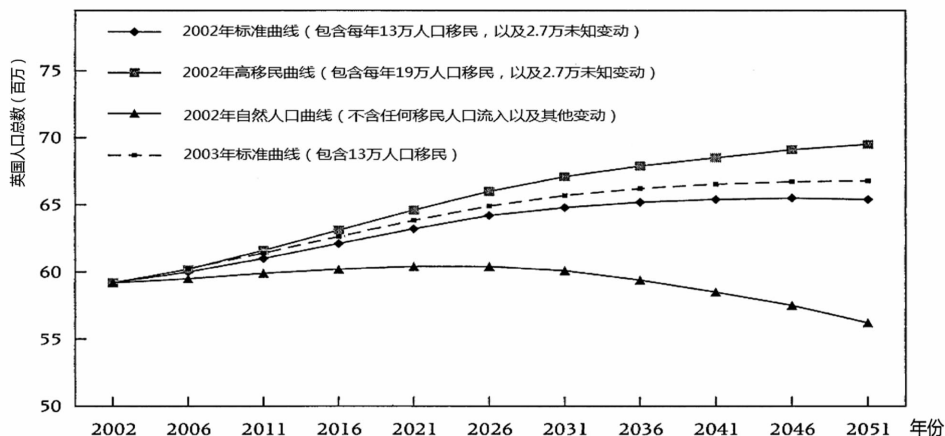


图4

年开始英国将经历一个长期的人口衰退,由5900万逐渐下降至2051年的5600万。而在2003年的标准曲线中,若每年以正常的13万人口的移民数量,英国人口将保持长期稳定健康的生长,到2051年达到6500万。若在更加开放的移民政策下,每年的平均移民流入数量将达19万,进入一个高移民水平,使英国人口在本世纪中叶达到6900万。同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等西方发达国家亦呈现出相同规律。从以上几组数据中可以看出,移民的流入优化了区域间人口资源的配置,不仅消化了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增长过程中的过剩劳动力,同时有效地解决了发达国家在经济高度发展后所产生的人口负增长问题。弗里曼认为,目前国际移民对全球效率的提升程度远大于进一步贸易自由化与资本投资^{[4](153)}。

2. 移民人口对移民输出国产生的经济影响

移民人口对输出国的劳动力市场、资金流向、消费、投资以及政府财政收入有着重要影响。人口移出/流失所造成的移民输出地区劳动力以及潜在劳动力的下降,使该地区市场需求减少,从而导致资金的流出。更细致地分类,可将流出人口分为低技能移民(泛指单纯的劳务输出人口,移民者通常不具备高等学历)和高技能移民(通常指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凭的移民者),因为不同层次的人口流失对区域经济造成的冲击有着显著区别。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务输出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在亚洲,输出的劳务量约占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60%,主要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泰国、菲律宾、韩国等。劳务输出人员中,低技能移民占70%,高技能移民(如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等)占30%^[11]。

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低技能移民的移出有助于平衡地区间差异,改善移民输出国经济状况^[12]。相比中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更加倾向于低技能移民的输出。其原因可大致归结为三个层次:首先,国际间低技能劳工的薪水差异要远远高于高技能劳工。其次,低技能劳工流动的进一步自由化对全球效率的提升要远高于高技能劳工^{[4](155)}。低技能劳工的移出,减少输出国相对应职业劳动力的供给,从而提高移民输出地区的同等工人的实际薪水。以历史上的爱尔兰为例,在1850—1914年间,爱尔兰经历了一次移民移出潮,人口由850万下降到600万,净人口移出达250万,其中绝大多数为低技术移民。而在这64年中,爱尔兰低技术劳工的实际薪水涨幅近4倍,大大高于了高技术劳工2倍实际薪水的涨幅^[13]。最后,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全球效率的提升将改善这些国家的经济福利体系,从而更加有效地保障了低端收入人群(低技术劳工)而不是高收入族群的利益。

相比之下,高技术人才的流失则对移民输出国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据统计,高技术移民流失将比低技术移民流失对移民输出地区造成更大的财政损失。这种“人才流失”现象对亚洲以及非洲的

一些国家的经济危害尤为严重。因为通常这些国家的公共服务产业比较薄弱,所以培养出高技术人才的投资成本相对要更大。因此这一部分人才的流失将造成当地生产能力的下降。例如,在2002年,居住在发达国家的非洲专业人员达10万,占非洲全部专业人员的 $1/3$ ^{[7](2)}。在印度,40%~50%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信息产业人才移民到发达国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了美国。《印度对美国高技术人才移民与财政冲击》的报告显示,每年印度移民在美国创造的财富使印度政府间接遭受财政上的净损失占印度国家总收入的0.5%,或占政府财政收入的2.5%^[14]。从产业结构来看,像印度这种由第三产业(服务产业)主导的国家,高技术移民的大量流失,可能导致服务行业人才短缺,从而使产业萎缩或缺乏竞争力。从政府支出的角度看,高技术移民所造成的移民输出地政府财政收入的损失,可能直接使政府支出减少,从而导致内需市场的缩小和产出的下降。

此外,人口移民对于移民输出地区的经济也产生了一些潜在的积极作用。有一部分移民将在移居地区的所得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回馈到他们的迁出地区,例如汇款、投资、技术、知识、文化交流等等。

从资金层面出发,移民人口从暂居国向迁出国的汇款数额急剧增加,对移民输出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算,在2003年,全球共有1310亿美元的国际移民汇款,其中790亿美元流向了发展中国家^[15]。这笔国际汇款的规模高出当年国际援助总数的两倍之多。有些移民输出地区甚至把移民输出看作一种机遇,而非危机。以劳工输出大国菲律宾为例,截止2005年,菲律宾登记在册的海外劳工有450多万,占其劳动人口总数的14.3%,每年移民汇款数额均在50~70亿之间。同时移民汇款份额占国家GDP的比例从1990年2.7%急剧上升到2003年的10.2%^[16]。由此可见当移民(劳工输出)作为一种产业而非自主行为时,移民汇款数量会随着移民数量的增长而增加,从而有效地刺激了移民输出国的经济发展。

从技术层面出发,移民人口从发达国家/地区所带回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理念、生产经验等等亦能潜在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更完善的经济、社会秩序以及管理体系,从而有效提高这些地区的生产效率。以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为例,这些国家/地区在崛起的过程中依赖了大量海外归国技术人员,同时这些国家、地区的领导人大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

从文化角度来看,移民人口间接起到了国际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作用。文化的交流,对区域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积极影响:①区域间文化的差异与碰撞,改变了一些地区原本固有的思维方式,开拓了国际视野,促使了新思想的诞生,从而进一步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以中国为例,自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几次革新都很大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影响。清朝末期,在受列强的入侵同时,一些西方的先进思想与生产、生活方式随之传入中国,从而颠覆和动摇了原本固有的封建制度,使中国迈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西方市场经济理念在中国的深入,也使中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从而走上了一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究之路。②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形成。历史上,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叶的美国经历大规模移民热潮。同时,国家经济实力由最初的与西欧持平,上升到二战后大幅超越西欧国家,成为超级大国。在此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促使美国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多元文化,而这种美国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不可否认地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今,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已是美国的重要象征,成为国家软实力之一,并且仍在不断吸引更多移民的移入。③有利于化解冲突,维护区域间和平稳定,增进国际间人民感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良好的环境。

(二) 区际移民

1. 发展中国家的区际移民

发展中国家由于外界以及诸多自身因素的限制,造成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因此,区际移民的趋势呈

现：移民由经济欠发达地区移入经济繁荣地区，通常为从农村到城市、内陆到沿海。自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也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沿海与内陆省份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地理优势以及国家宏观政策的导向，大量国内以及海外投资涌入东南沿海省份用于制造业以及基础建设。由此吸引了大量来自内陆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52亿（其中65.9%为男性，34.1%为女性）^[17]。同时，人均GDP最高的省份江苏省（东南沿海省份）已达7681美元（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人均GDP最低的省份贵州省（典型的劳工输出省份）为1953美元。从经济产业结构来看，内陆欠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仍由第一产业主导（农业、能源、矿产业）。因此，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尤其是男性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劳动力不足，进而导致该地区经济活力的下降。从资金流向的角度看，经济活力的下降，导致移民输出地区吸引投资的能力同时下降。同样用江苏省与贵州省做比较，截止2011年底，江苏省吸引海外投资总资产规模已达5396亿美元，而贵州省为5亿美元。从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观点看，资金跟随移民流向，追求资本回报的最大化。因此，移民人口过量流失从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区域间发展差距，加剧了两极分化，使经济欠发达地区形成了“经济萧条—>人口流失—>经济进一步萧条”的恶性循环。

2. 发达国家区际移民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以后都经历了一个后工业化的过程。以英国为例，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在此期间，英国的第一、第二产业（即农业与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由二战后1945年的49%下降到1990年的25%。同时，服务产业则有了大幅度上升，从1945年的51%上升到1990年的75%^[18]。

然而观察这一段期间英国区际人口移民的变化则可以看出，在20世纪60年代初，历史上处于劣势的英国北部与西部地区都相继经历了人口净移出的过程。这与传统经济学理论观点相吻合。然而在之后的1971—1991年间，区际移民的趋势则与之相悖逆。传统上经济较发达的东南地区在此期间经历了实质上的移出阶段，净移民变化达到-0.22%^{[8](133)}。人口数据的进一步调查显示，一些大都市所辖区域（例如大伦敦地区以及大伯明翰地区等）都倾向于人口流失。除了东北地区之外，农村和准农村地区都经历了大规模的移民流入。而且，在东米德兰兹、东部地区、西南地区与威尔士（都没有大都市化地区的特征）也经历了净移民流出。因此我们可以把英国后工业化时期的移民趋势归纳为：由最初的从欠繁华地区向较繁华地区，逐渐转向从大城市向小城镇与农村地区的流动。

从英国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随着国家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移民不再受到早期传统因素的限制，呈现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相悖逆的趋势。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同时，社会医疗、教育、福利系统的完善，以及国家最低薪水政策的出台，也大大减少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状况。此外，经济欠繁荣地区通常意味着低生活压力以及低生活成本，间接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以上诸多变化都促使了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向小城镇以及乡村回流。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不同国家、地区间移民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大多数国际移民，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区际移民趋势均与主流经济学观点相一致，即从低收入地区移入高收入地区。而部分发达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则呈现出与之相反的趋势。同时，仍有许多影响人口移民的客观因素未被纳入重点讨论范围，例如移民距离、移民成本、区域间失业率差别、宗教信仰、本土文化等。

从经济层面出发，两种主流经济学观点有效地概括了移民人口对区域间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即平衡区域间经济、或加剧区域间两极化发展。从实例中可以看出，目前移民人口的流入使大多数移民接

收地区、国家受益，保证了当地经济稳定持久的增长。反观移民输出地区，低技术移民的输出有效平衡地区间薪水差异，优化了人口资源配置。但是，移民人口的过量流失以及高端技术人员的流失亦会对输出地经济产生负面消极的影响。

综合来看，移民人口对区域间的经济影响很难用单一性的结论概括。它高度取决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移民类型以及移民数量等等因素。因此，如何从自身国情出发制定一套有效的移民政策对各国政府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发达国家在出台鼓励移民流入政策的同时，也应当区分不同的移民类型，从而能更有效地对流入人口进行分类管理，避免短期内人口波动过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本地失业率上升等）。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移民政策时，应出台相关刺激性政策鼓励高端人才回流。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如老龄化加速），亦应及时调整移民政策，以避免人口过度流失所造成的长期经济衰退。在当前形势下，只有制定一套科学的移民政策，才能使国际与区际间移民朝着健康稳定的趋势发展，创造双赢未来。

参考文献：

- [1] 联合国人口网站 [EB/OL].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proareas/population.shtml>.
- [2] 丘进.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5.
- [3] 欧盟统计部门官方网站 [EB/OL].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statistics_explained/index.php/Migration_and_migrant_population_statistics#Non-national_population.
- [4] Freeman, R B. People flows in globaliz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20 (2): 145 – 170.
- [5] 国际移民组织官方网站 [EB/OL]. <http://www.iom.int>.
- [6] Dumont, Jean – Christophe, Spielvogel, Gilles, Widmaier, Sarah. International Migrants in Developed,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Extended Profile [J].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2010, 114.
- [7] 朱其良. 国际移民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 [J]. *广西社会科学*, 2002 (5): 40 – 42
- [8] Armstrong, H & Taylor, J. *Regional economics and policy* [M], Blackwell Publishers, Oxford. 2000: 120 – 141.
- [9] Kaldor, N. The case for regional policies [J].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0, 17 (3): 337 – 348.
- [10] Oxford Economic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London'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J]. 2007: 2 – 5.
- [11] 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EB/OL]. <http://www.worldbank.org>.
- [12] Ruhs, M. Economic research and labour immigration policy [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8, 24 (3): 403 – 426.
- [13] Boyer, G., Hatton, T., and O'Rourke, K. Impact of Emigration on Real Wages in Ireland, 1850 – 1914 [G]. In T. J. Hatton and J. G. Williamson (eds), *Mi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arket, 1850 – 1939*, Routledge, London. 1994: 221 – 39.
- [14] Desai, M., Kapur, D., McHale, J., and Rogers, K. The Fiscal Impact of High Skilled Emigration: Flows of Indians to the U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8: 32 – 44.
- [15] Coleman, DA & Rowthorn, R.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immigration into the United Kingdom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4, 30 (4): 579 – 624.
- [16] Haas, H.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10, 44 (1): 227 – 264.
- [17] 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EB/OL]. <http://www.stats.gov.cn>.
- [18] 英国国家统计局 官方网站 [EB/OL]. http://www.statistics.gov.uk/downloads/theme_labour/LMT_June04.pdf.